

2009年12月19日,国际学术期刊《晶体学报》官方网站刊发社论,披露来自中国井冈山大学的两位教师至少70篇论文是伪造的,决定撤销。

《晶体学报》这一国际学术期刊随之进入公众视线。媒体发现,井冈山大学教师之所以如此热衷在这份期刊上伪造论文,是因为这份期刊为SCI所收录。

SCI (Science Citation Index), 翻译成中文为“科学引文索引”。能被SCI收录的期刊,其学术质量一般都较高。而能在这一期刊上发表论文,则是国内高校评定职称和博士毕业的重要依据。

把SCI纳入学术评价体系的办法,为南京大学首创。这个出发点善意的行为,为何最终走向尴尬? SCI该何去何从,中国新的学术评价体系又该如何建立?

这一系列问题,恰恰指向中国教育制度本身。

□快报记者 谢静娴 朱俊俊

谁在异化SCI



某些大学规定,博士必须发表两篇SCI论文方能毕业,这使部分人被校方“扣留” 漫画 俞晓翔

董健:没想到会变现在这样 南京大学原副校长董健教授讲述SCI的前世今生

董健出去开会,总会有教育界人士跟他半开玩笑:“董教授啊,你们南大是SCI的始作俑者,你看看它现在成了啥样子。”

董健会笑笑,“开始没想到会变成现在这样子。”

董健是南京大学原副校长,SCI评价体系建立之初,正是在董健任内。

“这是整个中国教育体制的悲哀。”董健说。

教授篇

“没有SCI论文,科研基金想都别想”

“从读博开始,我的命运似乎就和SCI联系在一起了。”南京大学物理系的博导兼教授黄新(化名)叹了口气。

如果发不出SCI论文,会有什么后果?

“那怎么行?”黄新条件反射般地回了一句。

“如果一篇发不出,肯定就申请不到科研基金了。”他解释,在申请基金时,其中就有一项极为重要的指标,那就是SCI论文的发表情况。在填写申请表时,必须写上原有工作基础,而此前发表的SCI论文便是最好的证明。

如果发不出SCI论文,那博导就惨了。“基金项目拿不到,

没法继续给学生发工资。科研没法继续,想再招学生也不可能。搞不好,这个研究小组就要垮台。”每年能发表多少篇SCI论文、质量如何,这成为黄新每年的头等大事。

“SCI牵扯了我们太多的精力。”他举例说,每个研究领域都会有高尖端、难攻克的难题,但很多教授和博导都不敢去挑战——问题就出在SCI论文上。一旦进入这一领域,很可能好几年都没进展,更别提发表论文了。

“就算不考虑我们自己,也得为学生想想啊。”黄新无奈表示,如果学生没有SCI论文,压根毕不了业。

博士篇

“五年了,我还差一篇SCI论文”

如果倒回五年,林星(化名)说,他肯定不会选择读博。这个博士,他读了五年了。因为还差一篇SCI论文,现在还毕不了业。“我是脱产读博,工作没着落,老婆也没着落,压力实在太大了。”年过三十的林星,白发已在两鬓扎根。

林星是南京一所名牌高校的在读博士生,本该两年前就毕业了,可至今还在为论文纠结。“学校规定,博士必须以第一作者发两篇SCI论文,否则不给毕业。”一进校,脱产读博的他就没敢放松。他确定了一个研究方向,做了大量实验。两年后文章快结尾了,可有一天发现别人抢先将论文发了出来。

“那一刻简直天崩地裂,这可是我两年的心血啊。”林星只能调整研究方向。林星后来发现,自己并非唯一倒霉蛋。又花费了一年多的心血,

林星的论文经两次修改后终于刊发。“太不容易了,单修改周期就耗费大半年。”

可是,林星的第二篇论文怎么也出不来。“可能岁数大了。”到了第五年,因没有第二篇论文他还没毕业。按规定,如果读博八年还毕不了业就得退学。

林星透露了一个数字,一般情况下,各高校几乎有一半左右的博士都会延期毕业,主因就是发表论文不够。“耗的时间越长,感觉压力越大。”林星说,博士没有医疗保险,住宿费还要按天计算。

前不久,林星参加了一场硕士生同学聚会。工作几年后的同学在事业上都有小成就,开着车、带着老婆孩子。可他至今还是个在读的穷博士:“早知道硕士毕业就直接工作了。”

受刺激的南大推出SCI

“教育有问题。问题不在教育。教育出问题是一个民族最大的问题。”

一个暖冬上午,董健坐在书房沙发上。这个74岁的老人,以敢于直言著称。在他看来,当时南京大学引进SCI学术评价体系,正是对当时不正常教育体系的反击。

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匡亚明时任南大校长。这位受人尊崇的老校长联合一批大学校长,给中央写信,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确立5所重点大学,由中央出资,办成世界一流大学。

这封信受到中央重视并很快落实。但让南大深受打击的是,最后确立的名单中,却没有南大的名字。“当时中央考虑到地域方面的因素。”董健回忆说,华东地区已经有复旦大学入选,所以中央最终没有把南大纳入。

落选让南大深受刺激。“以后,南大还有什么优势,让我们可以与其他大学竞争?”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几乎每个南大人都自问。

只有SCI不需要托关系

时任南大物理系主任的龚昌德(后龚德昌为中国科学院院士,中国著名物理学家)随后提出一个观点:搞基础研究,就一定要到国际舞台上竞争,要在国际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,要有SCI论文,要以此作为衡量物理系教师科研成果和水平的标准。这个想法,得到时任南大校长曲钦岳的支持,“要在科学论文的发表上体现我们南大的优势。”

SCI是美国费城科技情报研究所《科学论文索引》的简称,是国际上公认的、最具权威性的、对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。SCI收录论文数和它所统计的论文被引用次数,是国际公认的衡量科研机构和科研机构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。

在当时的南大领导看来,只有SCI,才是矫正学风的唯一办法,因为SCI没亲戚熟人,托不了关系。

在SCI体系中,南京大学终于找到了自尊。据《人民日报》2000年9月19日报道,南京大学从1992年起,SCI论文在中国大陆所有高校中连续7年雄居榜首;论文被引用数,从1994年起,连续5年担当“领头羊”;SCI论文10年总数也是稳坐“头把交椅”。

学术量化会酿恶果

“当时,大学知识分子心态都非常正,所有科研论文都是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获取的,这是SCI能取得正面效果的主因。”董健回忆。当时,南京大学通过SCI体系,推出了一大批知名学者,如龚德昌、吴培亨、陆谈等。但从1992年开始,SCI出现转折。

“这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有关。”董健分析认为,从1992年至1999年,应属于SCI逐渐恶化阶段。南大推出SCI体系后,北大、清华也相继推出SCI学术评价体系,最终,中国教育部“照单全收”,把SCI纳入对中国大陆所有大学的考核中来。

“一旦对学术量化,就会酿出恶果。”董健认为,教育部现在有一套完整的考核和评价体系,如一名教授该出多少本书,发多少篇论文,一个博士生又该发多少篇论文,只要够得上数量标准,教授等头衔就能授予你。

所以,董健特别怀念以前的学术氛围。董健回忆,上世纪80年代,他是南大学位评审委员会负责人之一。有位教授想要申报博导资格,拿出一大叠书,评审团专家一看,这些书全是教材,学术质量不高,于是予以否决。

“但现在,人家出的书比你多,发的论文比你多,根据当前的评价标准,别人的学术水平就要比你高。”董健说。

SCI成了对老师的压迫

“如果说,SCI在上世纪80年

代能促进学术水平的提高,那么现在,他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对老师和研究生的压迫。”董健说。

有学校不但把SCI作为评定职称和能否毕业的标准,还直接与经济效益挂钩。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,一些教师或研究生就会铤而走险,造假、剽窃……

井冈山大学的造假事件在全国并非个例,南京也多次发生教授剽窃论文的事件。其中,南京某大学教授原本是可以去参评院士的,但被同事揭发论文造假,院士资格因此被取消。

就在不久前,在南京大学的校报上,刊发了一位老先生的文章,呼吁要整顿学术之风。“他是有所指的。”董健说。

董健把2000年至今的SCI论文称之为“恶化阶段”。在董健看来,除非更改评价标准,否则无药可救。“现在的教育部,不是大学,却在办大学。有一句话在教育界很流行,所谓‘全国大学1000所,其实就教育部一所大学’。教育部制定了一整套游戏规则,也就是所谓的评价体系:哪个大学好,哪个教授好,不是由群众说了算,也不是由学生说了算,更不是由学校自己说了算,而是由教育部说了算。现在,大学领导唯教育部是瞻,唯评价体系是瞻。每年年底,教育部前来评审,大学领导就会战战兢兢。通过评审后,又会沾沾自喜。这种体制下,就会形成‘大学官僚化’。前一段时间,南京一所大学招聘一个处级干部,竟然引来100多名教授报名。如此热衷当官,学术怎么正常?”董健反问。

正如“SCI之父”加菲尔德博士所再三强调的那样:“永远要记住,SCI的主要功能是用于检索的。”加菲尔德博士说,SCI是一个客观的评价工具,但它只能作为评价工作中的一个角度,不能代表被评价对象的全部。

一组数据也为董健的观点做了注脚:2008年度,中国SCI论文数首次突破10万篇,总数为11.67万篇,较2007年增加2万多篇,占世界份额的9.8%,位列世界第二位,仅次于美国,超越英、德、日等国家。但从引用情况看,中国科技人员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,平均每篇被引用5.2次,与世界平均值10.06次相比,只有一半。